

中共蘇聯關係的微妙動向

尹慶耀

美國拉攏中共，當已察覺中共無力牽制蘇聯，美國可能把賭注放在防止該二者復合方面。可是，如果把中共和美國建交後的若干動向，和其「十一大」以前的對外路線相對照，我們會發現中共對蘇聯的態度已有很大的改變。對華盛頓而言，它玩「中共牌」的危險正逐漸呈露。

一九七七年八月十二日華國鋒在中共「十一大」中作「政治報告」，一九七八年二月廿六日又在五屆「人大」中作「政府工作報告」，這兩次報告中，對蘇聯仍然堅持一九六九年以來的立場，就是原則鬭爭要長期繼續，但不應妨礙雙方在和平共處五原則的基礎上使國家關係正常化。在前一次報告中，華國鋒抨擊蘇聯背叛馬列主義、復辟資本主義、推行霸權主義、蛻變成社會帝國主義；並着重指責蘇聯用種種手段，妄圖迫使中共改變毛澤東制訂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路線，指其爲「癡心妄想」。在後一次報告中，同樣指摘蘇聯是修正主義等等，也再度強調蘇聯要求中共改變毛澤東的革命路線，指其爲「白日作夢」。

指蘇聯爲修正主義，是從黑魯曉夫時代就開始了的。中共認爲把狄托領導的南斯拉夫看作社會主義國家，就是最大的修正主義。推行與美帝和平共處路線，背叛了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也是修正主義。這些論點散見於一九六三年九月六日至一九六四年七月十四日中共連續發表的「九評」中，尤以第九評「關於黑魯曉夫的偽共產主義及其在歷史上的教訓」一文中，更有集中的表現。中共又指布里茲涅夫政權推行「沒有黑魯曉夫的黑魯曉夫路線」，指蘇聯「物質刺激」「利潤掛帥」式的經濟改革爲修正主義。修正主義乃是共產主義的叛徒，中共把這頂帽子加在蘇聯頭上，就可聯合國際共黨及若干共黨政權反修。

中共指蘇聯爲社會帝國主義，是一九六八年捷克事件、蘇聯開始用武力推行「布里茲涅夫主義」（「有限主權論」）之後，用意在聯合鐵幕內外過去是或者現在仍是殖民地或被壓迫民族的國家反帝，同時就把中共的國際反美路線擴大爲反美反蘇路線。進入一九六九年，首先有尼克森「談判時代」的提出，繼之有中共和蘇聯的武裝衝突，以後更有蘇聯將對中共實施預防性核子突襲而美國插手阻止之說。同年十月廿日在北平開始的中共蘇聯邊界談判之前，中共政權發表聲明（十月七日），所謂把黨與

黨及國與國的關係分開，聲稱它和蘇聯之間存在着「不可調和的原則分歧」，原則鬭爭要長期進行下去，但不應妨礙兩國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基礎上保持國家關係正常化，就正式在這次聲明中提出。這表示中共堅持蘇共是修正主義，蘇聯不是社會主義國家，惟願適用社會制度不同國家間的關係準則——「和平共處」五原則來處理兩國的關係。蘇聯最初不同意，直到一九七二年三月（是尼克森訪問北平之後），布里茲涅夫才勉強認同了中共的上述立場^①。

七〇年代美國對北平與莫斯科同時「低盪」，攬起三角鬭爭。毛澤東經由鄧小平之口，於一九七四年四月在聯合國提出「三個世界論」。其時中共在國際間已高調「反霸統一戰線」，指美霸和蘇霸是第一世界，但美霸採守勢，蘇霸採攻勢，蘇霸較美霸更危險。中共要以第三世界為主力，聯合第二世界，甚至拉攏第一世界中的美霸，共同來反蘇霸。

蘇聯對於這些理論，自然是深惡痛絕。這可以從一九七六年二月布里茲涅夫在蘇共第廿五次大會的總結報告中體察得出。布里茲涅夫指中共領導人的政策，是公然反對大多數的社會主義國家；並稱這種政策與全世界最反動派的立場全然吻合，它不僅完全異於社會主義的原則與思想，而且實際上已成爲帝國主義反社會主義鬭爭的重要後備力量。布某指毛派思想與政策，根本就仇視馬列主義。因此他宣稱要與毛澤東思想繼續進行「原則性、絕不妥協的鬭爭」。布某也同意在和平共處五原則上關係正常化，但他更「很有把握地宣稱：如果北京恢復了真正以馬列主義爲基礎的政策，不再有仇視社會主義國家的方針，並且走上與社會主義陣營合作、團結的途徑，那麼這就可以從我方獲得相對的反應，並爲蘇、中良好關係的發展帶來一個機會，這種良好關係是符合社會主義的原則的。事情在於中國方面了」^②。這顯示蘇聯仍不放棄把中共拉回共黨陣營的想法，但必須粉碎毛澤東思想。

中共和蘇聯的分歧，原因衆多而複雜，但毛澤東思想和他的所謂「革命外交」路線，無疑是爭執的重要焦點，雙方關係改善的主要障礙。

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毛澤東死亡。蘇聯確曾認爲那可能是改善同中共關係的機會，因而有所期待。同年十月一日，阿歷山德洛夫（I. Alexandrov）在「真理報」發表論文，聲稱蘇聯和中共如果基於「睦鄰精神」，滿足相互願望，考慮到對方的利益，

註^① 一九七二年三月廿日布里茲涅夫在全蘇工會中央理事會代表大會上說，中國（共）官方代表，聲言蘇中（共）關係可以根據和平五原則改善，北京方面不願較此更進一步，就社會主義國家的關係準則作改善。既然如此，我們認爲現在蘇中（共）關係奠基在和平五原則上也好。布某此種表示，顯然受美國接近中共的影響。講詞原載《消息報》（一九七二年三月廿一日）一一三頁。

註^② 布里茲涅夫在蘇共廿五大的總結報告，見《真理報》（一九七六年二月廿五日）二一九頁。

那麼在「兩國關係」上，沒有什麼問題不能解決。他表示希望雙方在此一前提下加以推進^③。布里茲涅夫本人，則於十月廿五日在蘇共中央全會上強調說：「我們認為在蘇中（共）之間，並不存在根據『睦鄰精神』所不能解決的問題。我們將循此方向行動，事態的推移，將取決於對方的態度」^④。

當時，回國很久的邊界談判蘇方代表團長又返回北平，談判就重新開始。十月七日華國鋒就任中共黨主席時，蘇共也馳電申賀。截至一九七七年春，蘇聯都避免直接抨擊中共。然而，中共對此反應不佳。同年四月廿二日蘇聯紀念列寧冥誕時，蘇共中央書記季緬寧（M. V. Zimyanin）在講話中，指摘中共政策毫無改變^⑤。五月十四日阿歷山德洛夫再度發表論文，又開始抨擊中共，並指中共新領導人正加強戰爭準備^⑥。迨至前引華國鋒在中共「十一大」及五屆「人大」的報告發表後，蘇聯與中共修好的想法就完全放棄。

中共「十一大」所採行的仍然是毛澤東的對外政策路線，但在反霸統一戰線方面把「蘇」擺在「美」之前；又決定加緊推行四個現代化，在本世紀內把中國大陸建設成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的現代化強國」。五屆「人大」更提出「十年規劃」，設定了若干目標，來推進現代化建設。

須要在此補述的是，當時中共的外交處境並非有利。從一九七五年蘇聯、古巴挾安哥拉事件始，中共在非洲的勢力就逐漸退縮。越南「統一」後，河內更靠向蘇聯，迫使中共於一九七六年七月三日照會越南，停止對越南的經濟技術援助，調回當時還在越南工作的中共工程技術人員。又由於阿爾巴尼亞支持河內並抨擊北平的「三個世界」理論，中共於一九七八年七月七日照會地拉那，停止給予阿爾巴尼亞的一切援助。中共在共產集團和第三世界有可能被蘇聯逐漸孤立之勢，華國鋒乃於一九七八年八月下半月往訪羅馬尼亞和南斯拉夫，歸途又訪問了伊朗。

不過，一九七八年後半起，中共的對外活動重心是放在第二世界和第一世界中的美國方面。同年八月十二日和日本簽署附有「反霸條款」的「和約」；十二月十六日和美國發表關於建立外交關係的聯合公報，都可算是中共的成就。一九七八年秋和一九七九年春，鄧小平訪問了日本和美國。華國鋒於一九七九年十月十五日出發，訪問法國、西德、英國和義大利，十一月十日才返抵北平。他們的任務一是推銷反霸統一戰線，一是爭取外援推行「四化」，以提高對抗蘇聯的經濟與軍事力量。這二者是相輔而行的，中共必須表現出反蘇姿態，那些熱中「玩牌」的人才會對中共發生興趣。可是這樣一來，當然會激惱了蘇聯。

註③ 阿歷山德洛夫作「中共的二十七年」，《眞理報》（一九七六年十月一日）第四頁。

註④ 布里茲涅夫講話，《眞理報》（一九七六年十月廿六日）一一三頁。

註⑤ 季緬寧講話，《眞理報》（一九七七年四月廿三日）一一三頁。

註⑥ 阿歷山德洛夫作「北京：打着反蘇主義旗號，破壞國際緩和的方針」，《眞理報》（一九七七年五月十四日）四一五頁。

蘇聯抨擊中共的文章，多到不勝枚舉。一九七九年二月中共和越南之戰爆發後，莫斯科電臺曾於三月廿六日起，以華語摘要廣播了蘇共理論雜誌「共產黨人」的一篇文章，標題是「北京昨天是帝國主義的後備力量，今天是它的盟友」。文章首先引用布里茲涅夫的話，指中共推行的是大國霸權主義，具有侵略實質。文章指稱中共新領導人仍然奉行毛澤東思想與政策路線，只是捨棄毛的某些過於荒謬的主張，使其適合於建設軍國化國家的目的。文章列舉了中共所稱社會主義陣營已不復存在的說法；鄧小平同美國和日本領導人會談結束立即進攻越南的事實；北平願意接受外國貸款，打算在大陸開辦同資本家合股的企業和自由出口區的作法等等，把北平新領導的毛澤東路線作了一些評價。文章說毛澤東思想就是戰爭，北平現領導人把賭注押在世界戰爭不可避免上，押在對「緩和」的破壞上。又指毛澤東的軍國化是靠自力更生，現領導人則靠帝國主義援助，政治、經濟方面變成爲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的一個環節。文章指毛澤東把同華盛頓接近看作政治把戲，而今中共聯合美國已不是策略而是戰略，是長期的政策。於是，文章就斷言「北京昨天是帝國主義的後備力量（蘇共廿五大時布里茲涅夫斷語——見前），今天是它的盟友」^⑦。

三

以一九七八年底和一九七九年初的形勢而論，中共和日本及美國加強了關係，但是鬆鬆散散的說不上是什麼聯盟。蘇聯那個大霸（世界性的霸權）和越南那個小霸（地區性的霸權）之間，以及蘇聯與阿富汗之間，却都建立了條約關係，即使蘇聯出兵，也可拿那些條約作根據，那種關係就緊密得多了。把兩方面的情形作一比較，很難說中共在外交上佔了上風，但可以肯定地說，它在戰略上已處於腹背受敵的劣勢。

事後，據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部長、五屆「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姬鵬飛透露，鄧小平曾經說，這場仗「是打給人家看，不是打給自己看」的。姬鵬飛沒有進一步說明，所謂打給人家看，或許是因爲只要求人家反霸而自己不反不太好，打一下表示自己有反的決心和反的力量。但這一仗事實上打得並不好看，反而暴露了中共的許多弱點，顯示出中共的軍隊不能打現代化戰爭，因而也就沒有牽制蘇聯的力量。再者，中共攻擊越南的另一意圖，也許是想打鐵趁熱，乘與日本簽訂「和約」和與美國建交、鄧小平又親赴日本、美國進行了統戰活動之勢，「打出一條美、日、西歐、中共的「反霸統一戰線」，甚至可能挑起美蘇的直接衝突。可是，這些如意算盤都落了空。蘇聯對越南的支持雖極有力，但直接行動則極爲謹慎。美國警告中共不要再打下去。日本、西歐警惕到拉攏中共並不能增益和平，反而耽心它獲得援助後會胡亂闖禍。姬鵬飛講話中就透露西方國家害怕如果中共科技能達到世界先進行列，在高度集中與組織化的條件下，會變成社會軍國主義，進而成爲社會帝國主義，扮演亞洲或世界憲兵的角色，以致在武器裝備和科技方面加強與中共合作，也就有所戒懼，放緩了脚步，特別是在中共把一場「邊界爭端升級爲有限度的自衛

註⑦

原載於《共產黨人》（一九七九年三月）第四期，莫斯科電台於同年三月廿六至三十日連續播出。

反擊戰進入越南」之後⁽⁸⁾。

就當時（一九七九年初）的情勢言，中共的一切外交成就都被蘇聯的行動所抵銷，一場越戰更使中共陷於不利。因此，中共通知蘇聯，俟「中共蘇聯友好同盟互助條約」期滿後不再延長，應該是意中事。

不過，當中共「外交部」長黃華將中共五屆「人大常委會」不延長條約的決議通知蘇聯駐平大使時，仍建議雙方舉行談判，解決懸案、改善關係。其態度是相當慎重的。

在雙方改善關係的談判過程中，蘇聯建議：(1)雙方約定不得以核子或傳統武器實施軍事攻擊；(2)任何一方不得在亞洲與世界其他地區建立霸權；(3)雙方簽署一項類似一九七一年蘇法協定與一九七二年蘇美和平協定的原則聲明，中共不答應。中共希望作更廣泛的談判，把蘇聯從蒙古撤軍及完全停止對越南的軍事援助也包括在內，蘇聯則屢次聲言不犧牲第三國利益。由於雙方僵持不下，談判於一九七九年九月廿七日起，舉行過五次預備會議，又從同年十月十七日起舉行過六次正式會議，但迄無任何進展。乃於十二月三十日最後一次會議後，宣告第一輪談判就此結束。第二輪談判將在北平舉行，又因為阿富汗問題發生，一九八〇年一月中共乃將該項談判無限期延期。

「同盟條約」已於一九八〇年四月十日滿期，在此前後，蘇聯報紙廣播不斷對該項條約作分析、回顧，聲言它是「反映中國人民渴望的條約」，抨擊中共應對停止條約負責。

毛澤東生前有過一段話說：「到莫斯科，簽訂中蘇同盟互助條約，也是經過一場鬭爭的。他（史達林）不願意簽訂，經過兩個月的談判，最後簽了」⁽⁹⁾。奇怪的是，現今蘇聯只引用過去劉少奇的話，來證明「蘇中（共）友誼」和該約的「重要性」。

與蘇聯相反，中共對於該約已屆期滿一事，有意保持沉默，但這並不表示中共更漠視雙方的關係。事實上，關係正常化談判和邊界談判，早已決定分別舉行，名存實亡的「同盟條約」期滿，雙方仍留有接觸的管道。再者，擔任關係正常化談判的蘇方副代表團長、蘇聯外交部第一遠東司長岡比察（M. S. Kapisa），於一九八〇年三月二十日以解決蘇聯駐平使館內部事務為名飛抵北平，這位精通華語的中共問題專家，於同月廿五日與中共「外交部蘇聯東歐司」司長于洪亮會談三十分鐘⁽¹⁰⁾。談話內容雖未透露，但這是一項值得注意的接觸。

阿富汗事件發生，中共不斷猛烈抨擊蘇聯，但雙方的「國境河流航行聯合委員會」第廿二次例會，仍於一九八〇年二月五日至三月十九日在黑龍江省黑河鎮舉行。會議討論了黑龍江和烏蘇里江等中蘇國境河流上存在的航行和航道業務問題，達成了部分

註⁽⁸⁾ 一九七九年六月中共五屆「人大」二次會議期間，在「外交部」長黃華主持下，召開「駐外使節會議」時——姬鵬飛的講話。

註⁽⁹⁾ 一九六二年九月廿四日毛澤東在中共八屆十中全會的講話。見中共輯印之「毛澤東思想萬歲」，臺北，中華民國國際關係研究所複印本，四三二頁。

註⁽¹⁰⁾ 日本「朝日新聞」（一九八〇年三月廿日及廿七日）第七面。

協議。雙方同意第廿三次例會在蘇聯舉行，具體日期另行商定。雙方並就上述協議簽訂了會議紀要^⑪。據傳雙方的貿易談判不久也將開始。

四

我們不能忽略「紐約時報」較早的一項報導，說是中共正在估量摘掉蘇聯修正主義的標籤。一九七九年十一月該報揭載巴特斐爾德（Fox Butterfield）的一篇特稿，透露中共當局向其幹部們傳閱一份內部重要文件，它是總結中共「社會科學院」智囊團的總辯論，提供鄧小平參考的。文件認為蘇聯的主要生產工具仍掌握在國家手中，它不是修正主義，仍然是一個社會主義國家。文件說，目前來自蘇聯的主要威脅，是它的軍事上的擴張主義^⑫。

另一項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共同社」一九八〇年三月三十一日發自北平的電訊，報導一九七九年九月十二日至廿一日，中共「中國全國蘇聯文學研究會」在哈爾濱召開「全國第二次現代蘇聯文學討論會」，會議紀要中關於蘇聯社會制度的性質問題，據稱：(1)會中大多數「同志」認為蘇聯對外實行侵略、擴張政策，推行霸權主義，但在內政方面，基本上是社會主義，與史達林時代相較，並無重大變化。其經濟、科技均有重大發展，人民生活也已提高；(2)持此觀點的「同志」，主張應將（蘇聯）對外政策與內政加以區別；(3)相當部分「同志」認為蘇聯並未復辟資本主義，社會制度依然是社會主義性質，但（蘇聯社會）並非是完善的，是具有缺點和偏差的社會主義，和南斯拉夫的「開放的社會主義」和匈牙利的「適度的社會主義」有所區別；(4)所有制、經濟因素雖然是評定社會制度的重要條件，但僅祇有資本家、地主再度登場，不一定會變質成修正主義，也談不上復辟資本主義^⑬。

「紐約時報」所報導的總辯論，日本「共同社」所報導的討論會孰先孰後，且不必細究。但我們可以肯定地說，沒有中共黨方的指示，如此的辯論與討論是不會出現的。

又「共同社」同時報導，中共的蘇聯文學研究家程正民，於一九七九年底在黑龍江省「文學藝術研究所」發行的「文藝百家」雜誌上，發表以「關於布里茲涅夫時期文藝政策的若干情況和看法」為題的論文，指「布里茲涅夫時期，是由動搖、不安漸漸進入相對的安定的時期，政局比較安定，生產有重大發展，人民生活明顯的提高」^⑭。

目前，中共自己也在搞「物質鼓勵」和經濟體制改革，摘掉黑五類的帽子，發還被沒收的資本家的財產，對外則舉借外債，

註^⑪ ^新華社／北平（一九八〇年三月廿日）電。

註^⑫ 〔紐約時報〕（一九七九年十一月十日）第三頁。

註^⑬ 日本〔產經新聞〕夕刊（一九八〇年三月二十一日）第一面；日本〔朝日新聞〕（同年四月一日）第七面。報導中稱仍有「部分同志」指蘇聯為修正主義。

註^⑭ 同右。同期雜誌上曾抨擊索忍尼辛。

與外資合作開發大陸資源。替蘇聯摘掉修正主義帽子，無疑也帶有自我辯護的意味在內。但依時間來看，這些事是發生在美國副總統孟岱爾訪平時在「北大」講演中聲稱：「在今後十年內，一個强大安全和日益現代化的中國，也是符合美國的利益的」之後，而後兩件事發生的地點，又恰是中共反蘇的最前線。再把這些和最近中共將北平蘇聯大使館所在的「反修路」（文革高潮期命名）改為「東直門北中路」聯繫在一起來看，中共顯然有緩和對蘇關係的意圖。因為當中共與美國拉得越近時，它就越怕激怒了蘇聯，不得不轉彎抹角地表表態。

寫到這裏，又讓我們想起最近「華盛頓郵報」記者馬休茲（Jay Mathews）發自北平的一項報導說，中共共青團內部正傳閱一項文件，其中有一部分是「清華大學」副校長張光斗的講話。他描述美國是一個貪得無饜的、殘酷的帝國主義國家；是對內剝削、對外擴張的新殖民主義；指美國社會貧富懸殊，失業嚴重，自私無情。他對美國高談民主、自由、人權也多所抨擊¹⁵。（一九八〇年）四月六日「洛杉磯時報」對張光斗的講話斥之為淺陋。然而事實並不如此簡單。依時間看，這篇醜化美國的講詞，是在美國給予中共最惠國待遇、允許對中共出售軍事裝備和給予中共採購貸款的時候。講詞用意在提醒大陸青年，美國仍然是中共未來的敵人，不要走得太遠，步上親美、崇美之途。

中共對外擺出反蘇姿態才能爭取外援，但它並不希望使對蘇關係進一步惡化。中共拉攏美國才能嚇嚇蘇聯，但它並不真心把美國當作朋友。它對美對蘇都是「又聯合又鬭爭」的兩手政策。

五

兩手政策，堅定的原則性和靈活的策略性的辯證統一，中共運用得不為不妙。加以西方的「玩牌」心理，也幫助中共能以「一窮二白」的「家底」成為「超級大國」，縱橫捭闔於國際間。可是，時間一久，中共就難免力不從心，處處要捉襟見肘了。

捷克事件後，中共開始拉攏南斯拉夫，現今又歡迎義共總書記貝林格率領的代表團訪問中國大陸，「反修」的口號就難叫得響了。事實上，中共在共產集團和國際共黨中，早已沒有了朋友。

由於本身力量所限，中共一直以「反帝、反殖」為口號，糾合亞、非、拉新興國家（以後的第一中間地帶），用以世界農村包圍世界城市的戰略，企圖達成其世界革命的目的。但從六〇年代的「中間地帶論」時期開始，中共就想聯合第二中間地帶（以後的第二世界）合組由反美排蘇到反美反蘇的國際統一戰線，而第二中間地帶很多都曾經是「帝」「殖」號的國家，這也就使得「反帝反殖」旗幟無形中褪了色。到了七〇年代，中共已開始聯美，「三個世界論」仍然以第三世界（原第一中間地帶）為主力

^{註15} 臺北〔中央日報〕駐美特派員王爾佑華盛頓電，該報（一九八〇年四月一日）第二版。又〔洛杉磯時報〕亦有同樣報導，見臺北〔新生報〕（同月一日）第一版。

，以第二世界爲可以聯合的力量，去組織廣泛的國際反霸統一戰線，却把美國這個「霸」拉向自己一邊。聯合明天的敵人打倒今天的敵人，固然是一套妙用，但拉一霸反一霸，在別人看來，「霸」就「反」不起勁來了！

中共二十幾年的反蘇外交，結果是使自己深陷入蘇聯的包圍中。如果阿富汗之後，蘇聯再向印、巴伸手，加上蘇聯的海上力量，那中共就成爲甕中之鼈了！這種情勢它不能不注意。

舉目世界，如今誰是中共的朋友？

西方拉攏中共牽制蘇聯，原想可有益於亞洲乃至世界和平，結果是恰恰造成了國際局勢的緊張。中共聯合西方嚇阻蘇聯，也反而促使蘇聯縮緊對中共的包圍圈。世界局勢將如何發展下去？

伊、阿事件給人的印象是，美國軟弱無力，西方並不團結，而蘇聯的野心却毫不動搖。這會使中共想到，一旦它和蘇聯之間有事，西方能否一致給它支持，實不無疑問。巴基斯坦拒絕美援，施亞努也拒與波布合作，所謂反霸（包括大霸小霸）統一戰線的組成，並不像中共設想的那樣容易。一般人認爲卡特政府對蘇聯的强硬態度，只是臨機應付而並非長久政策，其中且含有競選的成分在內。法國似乎已開始自己的中東外交路線，西德不願開罪伊朗，其對蘇緩和的「東向」政策，尤早於美國的「低盪」。日本不願與中共軍事結盟，以免刺激蘇聯，而蘇聯已有在漁業等問題上對日讓步的跡象。儘管事非容易，萬一東西再度「和解」，那大嚷大叫「反霸（蘇）」的中共又將何以自處？

中共已替蘇聯摘掉修正主義的帽子，但仍指蘇聯爲軍事霸權主義。由於蘇聯也講「反霸權」，中共於去年初，曾爲文指摘如果蘇聯真的反霸，就該用實際行動來表現，那包括：

- (1)立卽從一些東歐國家和蒙古全部撤走蘇聯佔領軍；
- (2)立卽從一些非洲國家撤走蘇聯豢養的古巴僱傭軍，讓非洲國家自己解決國內的和國與國之間的爭端；
- (3)立卽從一些亞洲國家撤走蘇聯從事顛覆和控制活動的所謂軍事「顧問」、軍事「專家」以及其他以文職身分掩蓋着的軍事人員；
- (4)停止支持越南地區霸權主義者的一切對外侵略活動，採取實際行動制止越南當局成立所謂「印度支那聯邦」的吞併計劃，促使越南當局立卽從柬埔寨撤走侵略軍，從老撾（寮國）撤走佔領軍，恢復這兩個國家的獨立主權和印度支那地區的和平；
- (5)在世界任何地區停止對別國進行軍事威脅、干涉、顛覆和控制的活動；
- (6)停止擴軍備戰，全部裁減超過防禦需要的進攻性軍事力量^⑯。

這三「撤」三「停」的條件，蘇聯斷難接受，因此雙方合好依然不易。不過，像這樣尖銳的文章，在本來以反修（蘇）爲目

的「紅旗」雜誌上，也越來越少了。

另一方面，蘇聯的態度却依然強硬，似乎堅持要粉碎毛澤東思想。雖然中共從一九七九年十二月起就從事進一步貶毛，並醞釀為劉少奇平反；一九八〇年二月廿三日至廿九日的十一屆五中全會，更就平反劉少奇案作出了決定；但蘇聯的反應却十分持重。例如蘇聯「新時代」雜誌，於三月七日在漢字總標題「霸權主義」之下發表了四篇評論，都出自中共問題專家之手，其總的論點係指中共具有自古以來的「中華思想」和「霸權主義」傳統，現今中共的擴張政策以及將西方大國作反蘇的戰略運用政策是極其危險的。十四日該雜誌又發表華西里耶夫（Vasilev）評論中共五中全會的文章，其要點為：

- (1) 中共領導事實上承認了大規模鎮壓和文革時期多種方針的錯誤，惟將罪過全部諉諸林彪和「四人幫」而替毛澤東辯護；
- (2) 中共領導忠實遵行毛澤東路線的主要部分——民族主義、大國主義、霸權主義，依然維持文革時期建立的軍事官僚體制；
- (3) 中共領導為了使反蘇、反社會主義的內外政策正當化，仍有某種形式地維持毛澤東崇拜的必要¹⁷。

在蘇聯的邏輯方式中，毛澤東思想就是反蘇，反蘇就是反共。它希望中共「除惡務盡」，把毛思想連根拔除。但它仍然期待中共重返蘇聯集團，而不以在和平共處原則基礎上改善關係為滿足。

六

中共和蘇聯對立已久，重修舊好頗非易事。然而，蘇聯方面若干人士認為：「將來，（雙方）仍有恢復一定關係的可能」。

他們的看法是：(1)中共的工業以蘇聯的技術、設備為基礎，全部更替為西方式實不可能；(2)劉少奇平反所象徵的是，一九五〇年代推行對蘇協調路線的人們，將作為領導者或實務官員而次第復出；(3)中共方面對蘇聯的看法已有重要的變化，已出現了「蘇聯基本上是社會主義國家，並未復辟資本主義」的認識；(4)西方國家與中共利害並不一致，其接近必有一定限界¹⁸。

這項看法並非全無根據。中共的「四化」運動，原本可看作是為加強對抗蘇聯的經濟與軍事力量。惟一九七八年剛提出「十年規劃」，當年就發現拮据、失調、不切實際而趕緊收縮，大量凍結和外國簽訂的契約，一九七九年就進入調整期。另一方面又強調社會主義的現代化，「中國式」的現代化，想在社會主義制度的基礎上，引進資本主義的技術及經營管理方式，其結果必然是彼此格格不入，不是資本主義方式沖毀社會主義制度，就是社會主義制度扼殺資本主義方式。「四化」的最大敵人正是「四個堅持」，這不要很久就會使中共陷入宿命式的失敗。目前，中共把希望寄托在外來的援助和合作上，可是西方的軍事技術與武器已逐漸落於蘇聯之後，主要工業國家都陷入經濟困難甚至衰退的境地，它們無法滿足中共的需求，無力扶助它到能與蘇聯對抗的

註¹⁷ 轉自日本「產經新聞」（一九八〇年三月廿三日）第四面「國際時評」欄。
註¹⁸ 日本「朝日新聞」（一九八〇年四月七日）第七面。

程度。而且，對於中共實力增強後的動向，也不能不有所戒懼。在此情勢下，中共極可能恢復蘇聯的經濟模式，重新回到蘇聯的老路上去。

現今中共一方面在購買蘇聯乘用車、卡車、與能源有關的機器；一方面又把注意力投向蘇聯型的經營、管理制度；同時，中共的書店、圖書館又開始辦理函購蘇聯的哲學、文學書籍和科學技術文獻^⑯。這是一項值得注意的動向。

中共一向認為外交是內政的延長。當中共內部思想路線、政治路線及經濟路線有所調整時，對外姿態也會有所改變。前引姬鵬飛的講話中，就指出中共過去在外交路線上，不合時宜的提出一些不能為大多數國家所接受的理論和口號，造成外人不好的印象。他舉例說，中共所提「目前的形勢是天下大亂，越亂越好」，這個口號就很籠統，沒有明確的階級性，應該加以檢討。中共現在不再着重強調戰爭不可避免，改說它可以「推遲」，說西方援助中共「强大」可以推遲大戰爆發的時間。這雖然不是本質的改變，但中共現在似乎也很少說蘇聯是「新的戰爭的策源地」了。

各種資料顯示，當去年春，中共通知蘇聯不再延長「同盟條約」時，對於蘇聯社會的評價就開始了微妙的變化。當今年初中共為阿富汗問題大肆抨擊蘇聯對外政策時，在內部及社會主義的意識形態方面，對蘇聯的批判却慢慢消失或降低。當「同盟條約」屆滿失效時，中共却派出它從一九七九年五月就虛懸着的駐莫斯科「大使」^⑰。這些時間的巧合，不是出於無心而實是有意的安排。

我們沒有忽略，在「第二次現代蘇聯文學討論會」中，多數人主張摘掉蘇聯修正主義的帽子，但也有少數人持有異議，這個問題或許還在內部討論乃至辯論中。香港的左翼雜誌「廣角鏡」四月號中，透露一九七九年十月九日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副部長李一氓在一次講話中表示，六〇年代中共批判蘇聯為修正主義，這項反修鬭爭一開始就含有反霸的性質。真正的社會主義國家不會成為霸權主義，成為霸權主義也就不再是社會主義。他認為中共對蘇聯修正主義的批判，有部分錯誤，也有些不明確的地方，因而中共就提出霸權主義和社會帝國主義的概念，用來取代修正主義的概念^⑱。值得注意的是這樣一個重大的問題，中共的最高領導階層不曾發表意見，却在講話中不再常提修正主義，除了對外國人談話，有時該提也不提社會帝國主義或霸權主義^⑲。

註^⑯ 同註^⑮。

註^⑰ 前中共「大使」王幼平調「外交部」副部長，並擔任關係正常化談判的中共代表團長。中共於一九八〇年四月中旬調駐莫三鼻給「大使」楊守正轉任駐蘇「大使」，並將於同月廿日赴任。見日本《朝日新聞》（一九八〇年四月十五日）第七面。

註^⑱ 轉自日本《朝日新聞》（一九八〇年三月十五日）第七面。

註^⑲ 一九七九年九月廿九日葉劍英在慶祝中共政權成立三十週年大會上的講話，是經過中共中央討論通過的政策性重要文件，但內容並未抨擊「社會帝國主義」，三十日華國鋒在招待酒會上，亦避免談及反霸權主義。分別見《新華社》（一九七九年九月廿九日）北平電，及日本《每日新聞》（同年十一月七日）夕刊第二面。

就目前情況言，中共內部對蘇聯是否修正主義的意見，尚未完全一致。但如果中共替蘇聯摘掉修正主義的帽子，則中共一向堅持的「原則鬭爭要長期繼續」中的原則已不存在。只賸國家利害的衝突；如果中共繼續貶毛，把毛澤東思想一步步地否定掉，則蘇聯所深惡痛絕必欲除之而後快的目標，也就逐漸消失，而蘇聯也不反對同中共改善國家關係。果如此，則雙方有有限度和好的可能性就大為增高。而今中共在內政方面，已與毛澤東時代大不相同，那更會使它與蘇聯修好的時機提早到來。

目前，中共領導階層，表面上發言相當混亂。一九八〇年一月十六日鄧小平講話，仍把反霸列為三大任務之一。四月十五日胡耀邦對義大利記者談話，仍稱中共不可能與蘇共會談，這是指黨的關係而言^②。同一天香港「大公報」在頭條新聞中報導「同盟條約」失效時，却同時報導日本「時事通訊社」的看法，說今後一段時間，中共將一方面在國際舞台上譴責蘇聯霸權主義；另一方面在兩國之間的問題上，採取現實主義態度。這或許是比較接近事實的解釋。

不過，中共確已從其「十一大」路線上緩緩後退，是否會為北平和莫斯科的關係，帶來像布里茲涅夫在蘇共廿五大所講的良好「機會」，暫難作過早的判斷。但我們必須切記，中共與西方終難長期為友，中共與蘇聯也難永遠為敵。八〇年代是個多變的年代，把北平和莫斯科的關係看作一成不變，或是認為西方的努力可以阻止它變，都是不切實際而且異常危險的！

註^② ^ 新華社／（一九八〇年四月十五日）北平電。當時義共總書記貝林格（E. Berlinguer）正率團在平訪問。